

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

周文星 林 冈

〔内容提要〕发端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被两岸关系研究学者修正与运用。本文按照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的总体层次，对两岸关系研究的层次进行了类型划分，归纳和评价了对应的层次理论。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与价值偏好选择不同的层次理论，但单层次分析法因解释力不足而无法全面展现两岸关系的历史与发展。跨层次分析法与混合层次分析法有助于人们把握两岸关系实质，构建台湾研究理论，从而更准确地预测两岸关系的未来。

〔关键词〕两岸关系 层次分析法 跨层次分析 混合层次分析

〔作者简介〕周文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林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1959年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时率先提出了分析层次的选择问题。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源于决策者个人、国家内部和国际体系三个因素。^{〔1〕}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在论及国际关系学理论建构的功用时，将层次分析法视为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并将其分为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两个层次。^{〔2〕}继华尔兹及辛格之后，国际关系学者将分析的层次不断系统化与科学化。层次分析法有助于研究者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抽取关键的解释变量，根据这些变量建构出可供检验的因果机制，故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3〕}对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两岸关系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借鉴层次分析法。这有助于人们把握两岸关系的实质，创造相关理论。本文在对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提出两个更具解释力与预测性的替代性层次分析法，希望引起台湾研究学界的重视。

一、两岸关系研究的分析层次

台湾研究涉及政策与学理层面，政策性较强，理论性略显薄弱。在规范层面两岸关系自然不是国际关系，但从经验层面来看，两岸关系理论主要借鉴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者们如今仍然通过汲取其他学科中合理的理论养分，来充实台湾研究的理论框架。

由台湾政治学者包宗和与吴玉山主编的《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是近年来两岸关系理论研究方面较为系统的著作。参与撰稿的九位台湾学者基本都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在岛内较有代表性。

〔1〕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2〕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1 (1961), pp 77-92.

〔3〕 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溯》，《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2—142页；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4—10页。

他们根据台海两岸的实际情境，验证和修正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的相关理论，创造出多种两岸关系理论。他们将两岸关系研究区分岛内政治、两岸互动和国际因素三个层次，由此推演出十种理论，用于解释和预测两岸关系的发展。^{〔1〕}

本节重点评析与岛内政治和国际因素相对应的六个理论，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次将两岸关系研究细分为八个层次，并找出与它们对应的理论。

表 1 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层次及其理论

总体层次	因素层次	层次理论/途径	
微观	决策者个人	政治心理学途径	
中观	民意	选票最大化模型	
	政党及派系	权力斗争模型	
	经贸、科技、文化、人员的交流	整合理论	
		建构主义视角	
	利益集团	集团理论	
	军事与经济总量对比	权力不对称理论	
执政当局	博弈论		
宏观		国际体系	战略三角理论
			国际体系理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现有研究文献整理自制。

（一）微观层次

微观层次主要分析决策者个人的心理与性格，属于认知理论（cognitive approach）的范畴，其层次理论是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研究者们引入并分析了两岸关系决策中的主体与认同、思维与态度、精神与人格、认知与情感、知觉与行为等心理学概念，运用了包括内容分析、问卷访谈、虚拟实境、社会调查、历史分析、精神分析等在内的研究方法，来剖析两岸关系决策者的心理对政策的影响。^{〔2〕}冷战时期台海两岸长期处于对峙与隔绝的状态，因此运用有限的材料去分析决策者的心理和性格，成为理解两岸政策、探讨两岸关系的重要手段。如今，学者们仍采用这种分析方法。^{〔3〕}

比如，美国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问题专家陆伯彬（Robert Ross）指出，大陆对台的武力威慑以及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都无法解释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在大陆政策上大幅修正的原因。陆伯斌发现，台湾当局冒险主义的大陆政策源于陈水扁的性格及其对“台独”的承诺，因此陈水扁才具备强烈的意愿去挑战中国大陆“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4〕}

（二）中观层次

中观层次包括两岸内部的博弈与两岸之间的互动，分为民意、政党及派系、科技贸易文化及人员

〔1〕 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该著作于2012年再版，对原著中的相关概念和内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2〕 石之瑜：《芝麻！开门！心理分析引领两岸政策研究进入新境界》，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267—336页。

〔3〕 袁鹤龄、沈璨宏：《动态的台海两岸谈判：双层赛局与认知因素研究》，（台湾）《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期，第173—239页。

〔4〕 Robert S. Ross, “Explaining Taiwan’s Revisionist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of China*, Vol. 15, No. 48 (2006), pp. 443-458.

交流、利益集团、军事与经济总量对比、执政当局等六个层次（见表1）。中观层次试图将更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解释两岸政策的产出与两岸关系的变迁，因此具有多元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意味。

民意通过政党这个媒介发挥作用，主要层次理论是选票最大化模型（vote maximization model）。该模型假定，为了在政治选举期间吸引更多选票，政党会根据数量占优的中间选民的偏好，策略性地调整其政策立场。^{〔1〕} 由于统“独”分歧仍是构成台湾政党政治的主要社会基础，岛内民众对台湾当局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的认知倾向就显得更加重要。^{〔2〕} 相关研究表明，在台湾地区领导人或立法机构选举期间，台湾民众的政策立场非常显著地影响到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大陆政策。^{〔3〕} 由于权力斗争既表现在不同政党之间围绕选票的竞逐，也存在于政党内部各派系对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的争夺，因此权力斗争模型（political competition model）是理解政党及其派系的重要理论视角。学界一般认为，国、民两党都存在派系林立的现象，其中国民党派系隐形运作、缺乏组织化，而民进党内则具有“派系共治”的制度化特征。^{〔4〕} 尽管难以对派系政治展开实证研究，但不少经验研究已表明，派系政治与权力斗争对于国、民两党的大陆政策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5〕}

利益集团理论（theory of interest group）是研究政策过程的重要途径。^{〔6〕} 有的两岸关系研究者将台商视为主要的利益集团，认为它们在影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方面扮演着“政治中介”（political agency）的角色。^{〔7〕} 也有学者研究“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等海外利益集团与游说组织的组织结构、游说过程与政策结果，发现它们在美国涉台政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间接地影响了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走向和两岸关系的发展。^{〔8〕} 此外，经贸、科技、文化等因素影响了两岸人员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其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利益相关者，成为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9〕} 除了集团理论，整合理论（integration theory）也是理解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的重要途径。整合理论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新功能主义源于欧盟一体化的经验，遵循“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总体思路。按照该理论，两岸可以首先在低敏感领域合作，通过建立功能组织与合作机制，然后“外溢”到高敏感的政治领域，最终实现两岸的政治整合。从短期来看，整合条件、政治歧见、预期利益等阻碍因素增加了政治整合

〔1〕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

〔2〕 林冈：《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研究——以社会分歧与选举制度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9、33—94页。

〔3〕 Yu-Shan Wu,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Vol 53 (2005), pp 35—60.

〔4〕 倪永杰：《民进党执政后的派系结构、运作模式及其政治冲突》，《台湾研究》，2017年第2期，第20—28页；林冈：《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研究——以社会分歧与选举制度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0—31、160—231页。

〔5〕 Dafydd Fell,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Party Change and the Democratic Evolution of Taiwan, 1991—2004* (London: Routledge, 2005)；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年）；陈星：《民进党权力结构与变迁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刘国深：《民进党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郑明德：《一脉总相承：派系政治在民进党》（台北：时英出版社，2004年）。

〔6〕 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

〔7〕 Gunter Schubert, Ruihua Lin, and Jean Yu-Chen Tseng, “Are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 Strategic Group? Reassessing Taishang Political Agenc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ian Survey*, Vol 57, No 5 (2017), pp 856—884.

〔8〕 Catherine Kai-ping Lin, “Taiwan’s Overseas Opposition Movement and Grassroots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5, No 46 (2006), pp 147—153；卫平光、刘相平：《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与海外“台独”活动》，《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2期，第49—53页；张子介：《台湾游说集团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以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为例》，《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97—113页。

〔9〕 Karen M. Sutter, “Business Dynamism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2002), pp 522—540；Yung Wei, “From Functional Integration to Structural Readjustment: Taipei-Beijing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No 40 (2004), pp 427—460；殷存毅：《台资企业协会与两岸关系——基于集体行动逻辑和制度约束的分析》，《台湾研究》，2007年第2期。

的难度。^{〔1〕}但从长远来看,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有利于改善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认知结构、塑造两岸民众新的身份与认同,为两岸整合铺陈道路。新功能主义强调通过交流达到重塑身份与文化的视角,从而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approach)的理论主张不谋而合。建构主义具有心理文化分析的传统,它认为文化塑造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安全利益与安全政策。^{〔2〕}随着两岸之间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推进,由利益纽带创造的认同感将更有助于塑造两岸间共有的文化、改善两岸关系,为促进两岸统一创造条件。^{〔3〕}

权力不对称理论(power asymmetry theory)最初被用于分析军事与经济力量对比悬殊的国家间关系。一般而言,面临较强一方,较弱一方只能在扈从(bandwagon)与抗衡(balance)之间选择其一。扈从是为了迎合强者的需要而限制自身的行为、调整自己的政策,避免与强者的核心利益冲突;而抗衡则是为了与强者对抗,弱者会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或者寻求与第三国的结盟。^{〔4〕}经修正,权力不对称理论已被用于分析台海经济军事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对两岸关系的影响。^{〔5〕}执政当局层次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将执政当局视为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研究大陆中央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博弈;^{〔6〕}其二是将执政当局视为非单一行为体,考察两岸内部朝野政党之间与不同部门(如行政与立法)间的互动。^{〔7〕}博弈论(game theory)是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分支,可分析这两种情况下的互动。大量研究已表明,台海内外两个层次的博弈直接影响两岸关系的政策过程与结果。^{〔8〕}

(三) 宏观层次

宏观层次侧重于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或地区的外部影响,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两岸关系研究中,该层次理论有战略三角理论(strategic triangle theory)、国际体系途径(international system approach)与博弈论。美国政治学者罗德明(Lowell Dittmer)最早建构了一个战略三角的博弈

〔1〕 高明:《从整合理论探索两岸整合的条件与困境》,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43—75页;王英津:《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与路径探析》,《大平洋学报》,2015年第3期,第50—58页。

〔2〕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June 1994), pp 384—398;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李鹏:《从“战略竞争者”到“利益相关者”: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与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第1—7页;王贞威:《文化结构:两岸关系研究新视角的引入》,《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73—81页。

〔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Yu-Shan Wu, "Theorizing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ine Contend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5 (November 2000), pp 407—428; Yu-Shan Wu, "Theorizing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 Analogy with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1, No 9 (September 1995), pp 1—18; 吴玉山:《抗衡或扈从——两岸关系新论:从前苏联看台湾与大陆同的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

〔5〕 包宗和:《台海两岸互动的理论与政策面向(1950—1989)》(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吴玉山:《台湾的大陆政策:结构与理性》,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155—210页。

〔6〕 黄嘉树、刘杰:《两岸谈判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吴秀光:《两岸谈判之结构分析:由博弈理论出发》,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121—152页。

〔7〕 吴维旭、林冈:《“一致政府”下的否决者: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审议两岸服贸协议探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5—23页;朱云汉:《谁来驯服台湾“立法院”这只怪兽?》,《台湾》《天下杂志》,2016年第594期。

〔8〕 Szu-Chien Hsu,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President Ma's Cross-Strait Negotiation: CECA/ECFA as An Example," *Si Yu Yan (Thought & Words)*, Vol 49, No 3 (September 2011), pp 55—94; Chenghong Li, "Two-Level Games, Issue Politicization and the Disarray of Taiwan's Cross-Strait Policy after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22, No 3 (Fall 2005), pp 41—62.

论分析框架和三角关系的类型学。^{〔1〕}各行为体在不同类型三角关系中的角色意味着拥有不同的收益，为此它们具有提升角色、增加收益的动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可以提升自己与另一行为体的友好关系，也可以破坏另外两者间的友好关系。^{〔2〕}随后学者们将该理论运用于分析美国与两岸三者之间的互动，探讨了三角关系结构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3〕}国际体系途径指的是，冷战后美国作为单极霸权对相关行为体政策行为的重塑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台湾采取何种大陆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国家战略。^{〔4〕}台湾政治学者明居正认为，台湾比较理想的政策应是介于完全倒向大陆或美国，以及与大陆或美国对抗两者之间。^{〔5〕}涉及美国因素的两岸关系政策，实质是三方相互博弈的结果。可见，在三角战略理论与国际体系途径视角下，研究者需辅以博弈论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三者的政策。

两岸关系研究者根据他们的研究兴趣和价值偏好，从上述诸多分析层次中选择某个分析层次及理论展开研究。在理论的解释力方面，这些单层次分析各有优缺点。比如，微观层次分析法允许人们对决策者的心理与性格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但关注个别决策者的微观层次无助于建立广泛适用的理论。宏观层次分析法有利于研究者们把握国际体系结构——尤其是考察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但该层次几乎排除了岛内博弈与两岸互动。中观层次分析法则将更多中间因素纳入分析的范畴，既缺乏对微观层次的分析，又未能对宏观层次展开探讨。既然如此，是否存在一种取长补短、有效地整合单层次理论的途径呢？跨层次分析法和混合层次分析法是两岸关系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对传统单层次分析法的突破。

二、方法论的创新：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

（一）跨层次分析

自跨层次分析（cross-level analysis）在国际关系学中兴起以来，海内外学界尤其是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学者们将其广泛地运用于两岸关系研究。跨层次分析法强调了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总体层次下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机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单向作用过程。国际关系学中的跨层次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安全领域的探讨，试图通过结合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来解释国际进程与结果，如谈判与博弈、战争与冲突。其中最具代表的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

〔1〕 罗德明根据三边关系的友善（正面）或者敌对（负面）状态，将三角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即三边为正的“三方共处”（ménage à trois）、二正一负的“浪漫三角”（romantic triangle）、一正二负的“稳定婚姻”（stable marriage）以及三边为负的“单位否决”（unit veto）等四种类型。行为体在三角关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最有利与最不利的角色分别是枢纽（pivot）和孤雏（pariah）。请参见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1981), pp. 485—515;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Li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87), pp. 29—47.

〔2〕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1981), pp. 485—515.

〔3〕 Lowell Dittmer, “Taiwan’s Narrowing Strait: A Triangular Analysis of Taiwan’s Security since 2008,” in Peter C. Y. Chow, ed., *The U. S. Strategic Pivot to Asia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Dynam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Yu-Shan Wu, “Domestic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riangular Interaction among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The U. S. China Policy,”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 1 (2006), pp. 1—46; 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换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海台两岸三角互动为例》，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39—363页；罗致政：《美国在海台两岸互动所扮演的角色——结构平衡者》，（台湾）《美欧月刊》，1995年第10期，第37—54页；吴玉山：《抗衡或扈从——两岸关系新论：从前苏联看台湾与大陆间的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

〔4〕 Yu-Shan Wu, “Theorizing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ine Contend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5 (November 2000), pp. 407—428.

〔5〕 明居正：《国际体系理论与两岸关系》，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67—388页。

(Robert D. Putnam) 提出的双层博弈 (two-level games)。^[1]

所谓双层博弈,是假定代表某个国家的谈判者同时出现在国际与国内两个棋局上展开互动与博弈的结构形态。第一层次博弈在国际层次进行,是“谈判者们为了达成一项初始协议而展开的讨价还价过程”,而第二层次博弈则在双方国内层次展开,“选民围绕是否批准该协议而在各自内部展开的讨论”。^[2]协议在第二层次能否获得批准往往取决于谈判者国内就该协议取得的共识,即帕特南所称的“获胜集合”(win-set)。只有当双方胜集交叉(overlap),协议才可能获得批准;双方胜集越大,协议被批准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第二层次胜集过小从而可能导致协议无法被批准的情况,可以为己方谈判者在第一层次带来谈判优势。因此,在保证双方胜集交叉的情况下,双方谈判者可能会运用包括“自愿违约”(voluntary defection)与“非自愿违约”(involuntary defection)在内的诸多策略来提高己方在谈判时的筹码,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3]双层博弈理论内涵丰富,其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为考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连锁互动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理论视角。虽然两岸关系并非国际关系,但双层博弈理论及其相关概念仍被一些学者借用于两岸关系研究,试图解释内外层次互动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比如,台湾政治学者徐斯俭应用双层博弈的跨层次分析法建构了一个两岸谈判的政治经济二维(two-dimensional)模型。他以大陆与台湾围绕 CECA/ECFA 的谈判为例,动态地推理了大陆与岛内国、民两党之间的博弈,提出了“猜疑的影响”(suspicion effect)与“阴影的影响”(shadow effect)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岛内民众、泛绿反对党阵营与马英九当局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对当局的猜疑,为马当局在两岸谈判过程中制造了“意外的优势”(unintended advantage),进而缩小了两岸之间就协议达成的胜集,导致大陆对台让步,台湾获取更多利益;后者指的是由于大陆担忧国民党可能在下一轮台湾地区领导人与立法机构的选举中失利、民进党上台,从而更加愿意在谈判议题上有所让步。^[4]香港学者胡伟星等人将经济利益与外部结构的解释变量纳入到跨层次分析之中,分析了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作为两个最相似案例但却分别经历了对立与缓和关系的原因。他们发现,往往只有那些与对方内部现有利益及影响分配趋于一致(aligned)的涉外政策才容易取得成功,而且经济因素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换言之,由于大陆与美国在遏制“台独”方面达成了共识,以及两岸在经济领域的高度依赖,所以尽管陈水扁当局企图推动“台独”,但两岸关系仍然走向了缓和。反观朝鲜半岛,由于美国的反对以及朝鲜与韩国之间缺少经济合作动力,金大中与卢武铉谋求南北对话与国家统一的“阳光政策”却以失败告终。^[5]

[1]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June 1988), pp. 427-460;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June 1988), p. 436.

[3] “自愿违约”指的是在缺乏有力的内部限制因素的情况下,谈判者默许或者人为制造一个有力的内部限制因素,从而缩小己方胜集,提高谈判筹码;而“非自愿违约”则相反,指的是谈判者事实上面对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内部限制因素,客观上缩小了内部胜集,参见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June 1988), p. 438。在台湾案例中,非自愿违约的情形在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2008-2016年)期间出现较多,比较明显的如行政与立法的分歧、民进党在涉及大陆相关议题上的操作、“太阳花”学运的消极影响等,它们间接提高了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谈判时的地位。

[4] Szu-Chien Hsu,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President Ma's Cross-Strait Negotiation: CECA/ECFA as An Example," *Si Yu Yan (Thought & Words)*, Vol. 49, No. 3 (September 2011), pp. 55-94.

[5] Steve Chan, Richard Hu and Injoo Sohn, "Politics of Détente: Comparing Korea and Taiwa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6, No. 2 (2013), pp. 199-220.

通过对双层博弈理论的整体应用或对部分概念的深度演绎，台湾研究者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可见，跨层次分析法不仅提升了台湾研究的理论水平，而且为人们理解两岸关系提供了一个系统与动态的观察视角。

（二）混合层次分析

除了双层博弈理论，两岸关系研究者也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另一种层次分析法，本文称之为混合层次分析（mixed-level analysis）。顾名思义，混合层次分析法强调对两个或更多单层次分析及其理论的混合运用，是对传统的单层次分析法的突破和创新。虽名其曰混合层次分析，但它并不是对多个单层次分析的任意拼接，而是在保证理论建构的精确性与简洁性的前提下进行精心组合。精确性表明了理论的解释力，而简洁性则满足了理论应当遵循的“简洁即是美”的要求。如果随意选取多个单层次进行机械地拼凑与堆砌，各层次之间的解释机制缺乏紧密的理论衔接，不仅无法达到理论应有的精确与简洁，反而南辕北辙、无果而终。

在其研究中，吴玉山巧妙地运用了混合层次分析法，展现了理论建构的精确与简洁。他认为，两岸关系深嵌于一个由大陆、台湾与美国三方行为体构成的战略三角博弈结构中，两岸关系容易受到三方当中任意一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三方内部由于权力过渡与周期选举对政府造成的巨大压力也会制约它们在两岸政策上的立场。为了整合内外两个层次，吴玉山建构了一个序列模型（sequential model）。他指出，内部层次的政治竞争与国际层次的利益博弈之间存在一个有序的转换机制，而连接这个转换机制的正是周期性选举或者权力过渡安排。以台湾为例，当岛内选举临近时，台湾当局的政策反映了执政党的选举策略以及岛内政治形态；当选举结束且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巩固之后，台湾当局的行为则需要从现实主义那里才能得到充分解释。^{〔2〕}这个模型有效地整合（synthesize）了权力斗争与战略三角这内外两个层次理论，对三者的政策作出了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在精确性与简洁性之间也取得了较好的平衡。作者还建议将权力不对称理论纳入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解释台湾的大陆政策。^{〔3〕}

可见，对多个单层次分析法的结合运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一项深入完整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同时运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视角，结合运用多个层次分析法。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可以有效地整合单层次的优势，取长补短，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两岸关系的理解、推动台湾研究者的理论建构。在汗牛充栋的台湾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海内外研究者几乎都有意无意地运用了

〔1〕 Steve Chan, “Taiwan in 2005: Strategic Interaction in Two-Level Games,” *Asian Survey*, Vol 46, No 1 (2006), pp 63—68; Cal Clark and Alexander C. Tan, “The Paradoxes in Taiwan’s ‘Two-Level Game’ Concern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9, No 2 (2012), pp 89—104; Yi-wen Yu, Ko-Chia Yu and Tse-Chun Lin,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Beijing’s Patronage Policy on Taiwanese Business Sustainab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99 (2016), pp 372—388. 本文第一作者在与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C. Bush）访谈时，后者建议笔者运用四层博弈的理论框架去分析两岸关系。根据他的观察以及他从台湾内部决策者那里所证实的，观察台湾的大陆政策应该分为内部层次与外部层次，并进一步将两者细分为内部政治和内部政策，以及两岸关系和美台（或者台日）关系。他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制定大陆政策时，必须同时兼顾四个棋局上己方任何一颗棋子的移动以及给对方造成的可能反应（笔者面访记录，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布鲁金斯学会，2018年3月3日）。

〔2〕 Yu-Shan Wu, “Strategic Triangle, Change of Guard, and Ma’s New Course,” in Cal Clark, e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Relations among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pp 30—61; Yu-Shan Wu, “Domestic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riangular Interaction among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The U. S. China Policy,”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 1 (2006), pp 1—46.

〔3〕 Yu-Shan Wu, “Theorizing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ine Contend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5 (November 2000), pp 407—428.

混合层次分析。^{〔1〕}

美中不足的是，研究者在运用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方法时，遭遇理论上的局限，以及缺乏方法论的自觉。目前，跨层次分析法仅有双层博弈理论这一个层次理论，学者们只能在这个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小修小补，暂时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理论突破。不少研究者运用混合层次分析法时，只是将单层次的解释进行简单的罗列，未能在不同层次之间建立紧密的理论衔接，有待于树立高度的方法自觉意识，建立系统的理论模型，将这些单层次解释进行有效的整合。^{〔2〕}这是两岸关系研究者日后努力和加强的课题与方向。

三、结语

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但它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作为一项初步尝试，本文指出了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问题，对单层次分析法及其理论进行了类型划分，提出了混合层次分析概念，并在文献批判的基础上分析了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在台湾研究中的贡献及其不足。希冀本文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关注。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单层次分析法的解释力显得捉襟见肘。本文认为，一项好的研究应该整合多个单层次理论，展开多层次的系统分析。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是建立在对单向的、静态的单层次分析法的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多向的、动态的多层次分析法，在研究方法上是一种创新和进步。跨层次分析法凸显了两岸关系复杂多元的互动过程，它既是两岸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内部环境与外部结构相互博弈的结果。混合层次分析则说明，在将单层次分析进行科学有效整合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两岸关系的实质。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的贡献在于，它们可以指导人们更好地整合单层次的优势，提升人们对于两岸关系现实的理解、推动台湾研究的理论建构。但这两种多层次分析法存在局限与不足。尽管如此，本文认为两岸研究者应该在树立方法自觉、提高问题意识的前提下，注重对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的灵活运用。

（责任编辑：张笑天）

〔1〕 Jacques de Lisle, "Taiwan's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Space: Ma's Legacy, Tsai's Options, China's Choices, and U. S. Policy," *Orbis*, Vol. 60, No. 4 (2016), pp. 550-574; Dennis V. Hickey, "Parallel Progress: US-Taiwan Relations During an Era of Cross-Strait Rapprochem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2015), pp. 369-384; Steven M. Goldstein, *China and Taiwan*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5); Weixing Hu, "Explaining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 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8 (2012), pp. 933-953; Shelley Rigger, *Why Taiwan Matters: 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1); Nancy B.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 S. -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Suisheng Zha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1999); 孙哲、信强主编：《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大陆学者郑振清批判分析了两岸关系结构主义研究的两种路径，建议在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中层因素展开系统分析，并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政府、政治与国际因素等四层次的动力分析框架。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以反思两岸关系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一项研究。详见郑振清：《探索两岸关系研究“路线图”：两种理论模式与一种动力分析框架之比较》，《台海研究》，2015年第2期，第19-27页。

The Problem of Analytic Hierarchy in the Stud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Zhou Wenxing and Lin Gang

Abstract: The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revised and applied by scholar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hierarchy of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level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search, summarizes and evaluates the corresponding hierarchy theory. Researchers choose different hierarchical theories based on different research questions and value preferences, but single-level analysis cannot fully demonstrate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cause of its insufficient explanatory power, while cross-level analysis and mixed-level analysis help people grasp the essenc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build theories of Taiwan research to more accurately predict the fu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Key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AHP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ross-level analysis, mixed-level analysis

Authors: Zhou Wenxing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n gang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aiwan Research Center.



(上接第 62 页)

On Taiwan's "Transitional Justice"

Zhou Jia

Abstract: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Taiwan has begu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promoted the work of clarifying the truth, safeguard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upholding justice by mean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formulating normative documents. It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legislation" regulation, truth investigation, victim relief, "improper party property"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areas. However, under the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f the 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ransitional Justice"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of hasty "legislation", obscured truth, excessive correction and obstructed rights protection, and consequently deviates from the purpose of justice and degrade "Transitional Justice" into a tool of political party struggle and "Taiwan Independence".

Keywords: Taiwan, "Transitional Justice", political party struggle, tool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uthor: Zhou Jia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stitute of Law, Graduate Institute for Taiw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